

##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 马克思新闻自由观的历史语境与内涵重释

——以英国“反知识税运动”为背景

王润泽 王汉威

**【摘要】**争取和构建新闻自由的过程是西方新闻史书写的灵魂主线,其中19世纪英国的“反知识税运动”是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实践中的“反知识税运动”主要存在于当时议会辩论和精英报纸讨论中,学术研究多集中于新闻史领域。但细查议会与新闻史文本,新闻自由分别指向了“法权说”和“市场说”,实践中二者存在明显的冲突和局限。彼时马克思亦在报业活动中阐释了“能动说”的新闻自由内涵,对报业垄断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批判,通过对实践性、人民性和能动性的揭示,进一步丰富了新闻自由的认知,澄清了新闻自由观念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语境下,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念以人民性为挈领,仍有着深刻的现实关切。

**【关键词】**新闻自由;报刊印花税;人民性;实践;能动性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wrunze@ruc.edu.cn;王汉威(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wanghanwei@ruc.edu.cn。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22.6.183~19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研究生)“马克思的报刊实践与英国‘反知识税运动’”(22XNH182)阶段性成果。

作为“一切自由的基础”<sup>①</sup>,新闻自由是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综合产物,经历了一个被长期构建的过程。其中,英国历史上的“反知识税运动”就被认为是西方新闻自由建设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sup>②</sup>:在国内外比较主流的新闻史知识体系中,此事件被定义为一场通往新闻自由的重大胜利;从英国议会历史出发,自由也是“知识税废除促进联盟”成员多次提及的词汇<sup>③</sup>;马克思在旅居英国期间也数次发表报纸政论抨击报刊印花税,将其称为“禁锢以自由精神进行创作的一种制度”<sup>④</sup>。然而,屡次被提及的新闻自由在当时英国议会讨论、新闻史著作和马克思的文本实践中是否具有一致的内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应当怎样理解。所以,有必要厘清历史细节,从而剖析新闻自由诞生时期隐秘的政治和经济基因,正确阐释马克思新闻思想的内涵逻辑和目标指向,指

导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创新发展。

## 一、新闻史书写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与报刊印花税

西方新闻史研究有一条根深蒂固的主线,即“新闻历史被看作是新闻行业的精英们在不断地追求新闻自由、民主的进步过程,它是完整的、线性的,一脉相承的过程”,虽然新闻史研究经过辉格主义、进步主义、新闻文化史和新闻实践史等范式转变,但“新闻是与民主相伴相生的人类实践”的结论性认知在学界很有影响,自由被认为是新闻专业合法性和内在本体价值的核心。<sup>⑤</sup>正是对这一专业内在价值的追求,关注对外在禁锢和阻碍的冲破就成为新闻史研究“天然正确”的逻辑路径,18世纪前后英国报刊印花税也相应地被置于社会控制的理解范式下,被纳入大众传媒历史写作中“自由和民主斗争”的解读谱系中,并进一步强化之。<sup>⑥</sup>

具体而言,报刊印花税被西方新闻学界理解为一种间接的“对新闻自由的压制”<sup>⑦</sup>，“反知识税运动”相应地被理解为对这种控制的反抗——“为异见观点争取更大自由的努力”<sup>⑧</sup>，针对报刊印花税的政策起伏也被理解为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垒<sup>⑨</sup>，这种理解对于国内学界影响不小，有学者迁移其观点，将彼时初步奠定立宪制并具有资产阶级财政政策性质的英国印花税政策归于“专制政府……发明的一种控制手段”<sup>⑩</sup>。考虑到彼时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状况，更吻合历史实际的应当是李彬教授“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王国政府”的表述和张允若教授对“资本主义色彩”的强调。<sup>⑪</sup>

另外，国内从革命史观出发的相关研究也认为这是“控制出版自由”的手段<sup>⑫</sup>，这种表达在相当程度上被延续下来了。在今天的主流学界看来，报刊印花税始终被认为是“政府压制”“出版控制”“经济政策控制”“管制出版的特有形式”“控制新兴资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手段”<sup>⑬</sup>，其目的也仍被认为是“控制激进内容”“压制激进主义的言论”和“消灭那些出版扰乱政府秩序内容的小报”<sup>⑭</sup>，陈力丹教授由此旗帜鲜明地将印花税的废除称为“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的最后确立”<sup>⑮</sup>，还有学者类似地将其视为“英国新闻传播最后的桎梏”的打破或是“出版自由的胜利”。<sup>⑯</sup>这里所提到的自由的内涵也就比较明确了，黄旦教授援引埃默里(Michael Emery)之语称其为“冲破那些为阻止信息和思想的流动而设置的障碍”<sup>⑰</sup>，必须指出，这里所涉及的“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中设置障碍的主体仅指政府<sup>⑱</sup>。可以说，这种自由主义范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政府压制的反抗的书写模式下形成的，这种模式书写的潜台词是，政府是新闻自由理念和实践过程中最大的和唯一的障碍，在这种理解中，只要政府认可了新闻自由的理念规则和实践步骤，新闻自由的目标就可以达成。所以，新闻史写作中的新闻自由范畴不自觉地成为一种需要政府加以承认的自由，继而使得政府对这种自由的承认与否也成为判定其进步或反动、民主或专制的标准。

基恩将新闻自由原则分为四类，分别概括为神授理性(弥尔顿)、天赋人权(丁德尔、洛克)、功利主义(边沁)和公共讨论获得真理(约翰·密尔)。⑲除去鲜见

于新闻史的边沁(Jeremy Bentham)和时代不相符且更注意“防范公众自身对异己的侵犯”的约翰·密尔(John Mill)<sup>⑳</sup>，余下的两组思想家就出版自由的权利性质是能达成共识的。弥尔顿(John Milton)将“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称为“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sup>㉑</sup>；洛克(John Locke)则提出“任何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任意使各个字眼来表达自己的观念”<sup>㉒</sup>。但一旦在政治、社会领域延伸这一概念，自由就基于天赋人权所推论出的有限政府成为“平等的权益”——这种“普遍主义”本质构建了其自由观念在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桥梁”。<sup>㉓</sup>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论述更为具体：“讨论自由是指平等地表达和讨论与主题相关的所有意见的权力，以及通过任何作者认为合适的媒介将讨论意见推荐给他人的权力。”<sup>㉔</sup>虽然这几位思想家的论证起点差异颇大，但仍旧能达成一点共识，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出版)自由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sup>㉕</sup>，又可以说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出于行文的方便，笔者将这种大多数新闻史叙事中一以贯之的新闻自由观念称为“法权论”。

那么，将这一概念置于印花税范畴的考虑之下是否合适呢？之前笔者业已探讨了报刊印花税是服务于财政目的的：从其立法、税率提高，再到税率下降至废除，都与英国彼时的对外战争和财政状况高度相关，主观上英国议会压制报业的诉求也并不明显。<sup>㉖</sup>所以，讨论这一政策的社会控制属性就需要从其客观影响方面着手。诚然，18世纪报刊印花税对于报刊行业的影响是比较负面的，这在诸多新闻史著作中均有涉及，然而到19世纪，负面影响慢慢变得不那么明确，尤其是印花税废除后代表底层民众立场的激进报刊迅速消亡。<sup>㉗</sup>所以，将报刊印花税整体纳入自由主义报刊实践的轨道中并不准确。印花税在历史中真实面貌到底如何，当时议会辩论双方的文本是重要线索。

## 二、从“法权论”到“市场论”：反知识税议员的自由观念

实际上，在废除印花税相关议会讨论中的自由，其内涵更靠近经济层面的自由市场而非政治层面的自由权利，正如英国著名媒介史学者卡瑞(James Curran)

在《有权无责》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新闻史学界公认的“自由报业史观”是一个“政治神话”,有学者沿其思路指出这种印花税废除后如何保证和促进新闻出版独立自由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仍存在“政策难题”<sup>②</sup>,“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sup>③</sup>。然而大多数新闻史著作其实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仍然沉浸于这种神话之中,这就需要先理解这一范式中的核心观念——自由在历史实践中的实现何以背离了“法权论”者的期待。

### (一)19世纪前期成为议会共识的自由权利

区别于新闻史中所描绘的政治理想,议员们所论证的依据其实是更贴近历史真实。当我们聚焦于英国报刊印花税在议会被讨论的历史现场和发言细节,很容易会发现当时的议会斗士们与历史赋予他们的自由主义人士的角色有着明显的矛盾,这些议员们更重视的是印花税于国家财政的影响。<sup>④</sup>从19世纪英国议会涉及报刊印花税的117次辩论中,笔者提取出267条相关发言,经统计发现,自由在其中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汇,与此同时,平等和公平是废除印花税更常见的伦理依据:freedom和liberty合计出现不过18次,而equal和justice则各出现了15和17次,与之意思相关的unfair、injustice、privilege亦分别出现了7、7、17次。这足以证明,将反知识税运动置于新闻自由的历史书写或许并不符合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最核心诉求。实际上,废除印花税的伦理基础在30年代并没有得到特别大的争论,更多的是围绕“策略”——即如何弥补报刊印花税废除后的财政亏空展开的。在相关讨论中,fiscal被提到至少33次,financial被提到不少于22次,相关的finance、budget、income都被多次提及。当然,这只是削弱了反知识税运动作为自由观念实践的依据,毕竟自由与其他方面的诉求并不冲突,还是需要进一步关注到自由在议会讨论中的具体语境。

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意涵理解,新闻出版自由作为一个相对次要的话题,已经是彼时议会讨论的共识所在。至晚于1815年,议员詹姆斯·斯坦厄普(James Stanhope)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广告和报纸的额外征税“侵犯(impede)了出版自由”<sup>⑤</sup>，“反知识税议员”布威-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态度更为典

型:出于“广泛传播知识”的诉求,新闻自由应当通过减税得以保证<sup>⑥</sup>。同时,即便是支持印花税的议员也绝不愿意站在新闻自由的对立面,比如特雷沃(Trevor)议员特意声明自己不是“出版自由的敌人”<sup>⑦</sup>;时任财相赖斯(Thomas Spring Rice)则认为在印花税法案下打击冒犯(offence)政府的无印花报纸并不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相反能够使新闻免受“金钱和偷渡的损害”<sup>⑧</sup>。这与彼时颇具影响力的詹姆斯·密尔的观点接近:“阻碍政府具体运作的规劝应被看作侵害”<sup>⑨</sup>,并不受新闻自由保护,在他们看来,印花税非但没有妨碍新闻自由,而且是保护新闻业正常运行的一种方式。总体上讲,持方不同的议员虽然都有一些涉及新闻自由的论述,但对话意味不浓,不过,这种屡屡的自说自话至少能说明,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新闻出版自由作为一种共识已被广泛认同。

### (二)19世纪中叶议会辩论中的自由内涵嬗变:从弥尔顿到亚当·斯密

既然“法权论”层面的新闻自由已经成为当时议员们的共识,但这并未直接促成印花税的废除。表面上看,自由在印花税相关的议会发言中出现频率并不高,也没有形成有效论辩,而且报刊印花税并没有在自由呼声出现之后迅速降低并废除。随着议会辩论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印花税相关辩论中自由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废除印花税从“对自由的权利”的诉求,逐渐变成了一种对特定经济秩序的诉求,具体表现为对自由贸易、低税率和高工资的要求。

这里的自由成为贸易的定语,即一类社会经济的运行原则,而不是聚焦于个体的法权范畴。秉持这种诉求的是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sup>⑩</sup>的社会政治团体,在反知识税运动中颇为关键的科布顿(Richard Cobden)和布莱特(John Bright)均是其成员。曼彻斯特学派始终鼓吹古典经济学,这也反映在了印花税相关的议会讨论中,比如1853年,财相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就纸张贸易问题说道:“在我看来,纸张税是一种不恰当、不具政治性的税……因为如果纸张贸易是自由的,就不会局限于人口众多的中心,而是会根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找到出路,并为不同阶层提供就业”<sup>⑪</sup>。吉布森(Milner Gibson)更加全面地展示了曼彻斯特学派如何

协调古典经济理论中自由贸易与高产出(税收、工资)之间的矛盾：“对邮局经手的所有印刷品收取简单的邮费，就可以收回因废除印花税而所损失的不少金额，然后将印花税作为收入问题来处理就不会有那么多担忧声了。”<sup>⑧</sup>前者认为取消印花税可以带来非中心地区的纸张交易，通过扩大交易地区和交易量提供相关的就业，而后者则直接建议变换收入的渠道来抵消关于印花税的讨论担忧。这样的认知是将原先作为税收的财政收入手段变为政府服务，将带有专制色彩的、强迫性质的不合理捐税转变为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给予报业自主选择的政府服务费用，让收费的市场色彩更为充分，并借此降低行业的运行成本，推动行业繁荣，这正是曼彻斯特学派用以平衡两者的关键前提。

可以看到，自由在19世纪中叶的议会讨论中被经济化了，成为了实现繁荣的工具，其导向的是物质生活而非之前所谈的自由权利所对应的政治生活。这种自由主义将自由竞争作为至高原则，以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也符合了彼时政界的功利主义取向，如布莱特在议会上讲演的引自《纽约时报》的内容：“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了这种税的荒谬性，因为它是对报纸的税，是对知识的税，因此是对光、对指引、对真理的税，对公众舆论、对良好秩序和良好政府、对社会、对人类进步和运作的税”<sup>⑨</sup>。一方面，报纸仍然是具有神圣意味的光、指引和真理；另一方面，公众舆论、秩序、政府这些社会存在也被并列于此，因为秉持光和真理，所以自由是天赋的权利，又因为社会的客观实在，自由又在彼时的英国成为经济的运行秩序(暂称为“市场论”)。布莱特的这段表述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自由内涵混用的体现，其中的矛盾之处未必在当时被像他这样的议员察觉到了。

### (三)戛然而止的神话：两种自由观念的冲突

报刊印花税的废除既可以看作是自由权利的胜利，也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胜利。但期待中的报刊自由并没有来到新高度，19世纪后半叶英国报业却出现了另外的现象：一是激进报刊的迅速消亡，二是垄断报团的出现。报刊印花税的废除有些种瓜得豆了。

上文提到，曼彻斯特学派以繁荣为前提，调和了自由贸易与高工资之间的矛盾，对于企业来说，繁荣

固然好，但高工资带来的营业成本的提升是更直观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印刷工人的工资节节攀升，成为所谓“劳工贵族(labor aristocracy)”<sup>⑩</sup>，1862-1875年间，英国工人收入增长近四成<sup>⑪</sup>，又由于报刊行业时效性的要求，印刷工人的罢工相较其他行业更具威胁。此外，印刷技术愈发集约化、机械化，这也使得“报业经营的固定成本急剧提高”<sup>⑫</sup>，以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为例，其创办《每日邮报》的花费不少于50万美元。简言之，办报成本19世纪中后期得以迅猛上涨，廉价的办报路径不再可行。

因此，原先“不依赖津贴和广告”的激进报刊很难重现宪章运动时期的荣光<sup>⑬</sup>，“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sup>⑭</sup>，在19世纪后期，少数拥抱了大众化报刊潮流的左派报刊以专业期刊或社区报纸的形式延续下来。另外，高固定成本也导向了规模经济，报纸运营者只有不断提升印刷量(发行量)，才能降低边际成本、分摊个别成本，报业愈发成为“更具商业吸引力”的产业<sup>⑮</sup>，报业巨头在19、20世纪之交纷纷涌现，到1910年，三家最大的英国报团发行量已经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67%<sup>⑯</sup>，曼彻斯特学派所呼吁的经济平等的愿景在实质上迅速地被瓦解了，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赞许的便士报(在英国)能够加以构建的“民主市场社会”在彼时也并不存在。<sup>⑰</sup>

尽管将报业运行成本提升完全归于报刊印花税的废除并不客观，但是在报刊印花税时期，报纸仍然可以选择拒缴税款来规避合规成本、从而与《泰晤士报》等大报一较高下的机会——毕竟行政辖制在30年代中期后愈发松弛。当时一位议员的判断就很符合目前新闻史学家的书写：“不应该通过这种税收，人为地创造资本的必要性，从而使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被少数富有和不负责任的寡头垄断。”<sup>⑱</sup>这位议员代表了历史的美好愿望和逻辑：印花税的存在人为制造了资本对于“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的垄断和控制，消除印花税就可以消除垄断，但现实是，印花税废除后的短短半个世纪之内，报业的垄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无疑揭示了“法权论”和“市场论”两种自由内涵之间的矛盾。报刊印花税的废除使得新闻自由确实在法律上得以更深入地实现，但在实践层面却使自由迅速归于少数人，这也正是许多学者所一直批判

的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sup>④</sup>另外,法律的允许与可达成的实践中间并不可简单地画等号,自由市场虽然搭建了两者的桥梁,却将“自愿”和“自由”的含义混淆起来了,使得市场机制由于市场主体的“自由”行动而成为自由的某种象征,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柯亨对自由主义者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批判,自愿行为会产生外部性,从而影响到社会权力结构;同时,资本主义所应许“自愿”的选择范围往往是有限的。<sup>⑤</sup>如前文所言,如果将自由视作权利,这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也同时是“一种平等的状态”。<sup>⑥</sup>而当这种自由成为集体的经济社会运作机制,这种原初并不存在内生性不平等的机制就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阐明的,最终大概率会导向“马太效应”——即垄断,从而推翻既有的平等状态。<sup>⑦</sup>这种机制在舆论场,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也始终存在。<sup>⑧</sup>

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经济秩序的自由在印花税法议题上的混淆是一以贯之的,支持自由贸易的反谷物法同盟与反知识税联盟在时间和成员上重合度很高,在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之后,经济层面的自由内涵在“反知识税运动”中与既有的法权层面的新闻自由内涵在实践中发生了合流。布莱特在1853年议会关于广告税的讨论中旗帜鲜明地说:“财政困难只是一件掩盖他(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潜在恐惧的外衣,以免人民拥有自由的媒体(a free press)和更广阔的政治信息渠道。”<sup>⑨</sup>这里提到的新闻自由其实更接近反抗政治权力的内涵,考虑到布莱特作为曼彻斯特学派核心人物,他其实是把这种自由权利纳入其自由市场的构想中,从而当作议会论辩的武器。作为政府控制的对立面时,这两种自由观念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当这种被称为压制的政策被取缔后,新闻史所采用的作为政府压制对立面的新闻自由的内涵就迅速失去了现实意义。尽管在市场体制下,我们仍然可以“任意使各个字眼来表达自己心中的观念”,工人阶级也不例外,但在报刊印花税被废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占有资本的工人阶级无法承担报纸的运营成本,甚至“遭到了发行商的联合抵制”<sup>⑩</sup>,当表达失去了公共化和社会化的可能,这种新闻自由还有意义吗?就像张好玫在描绘18世纪上半叶激进报刊时所说的:“经济上的独立使激进主义报业拥有了表达观点

的自由。”<sup>⑪</sup>当这种基于物质的独立随着大众报业的豕突狼奔而瓦解,新闻自由自然也是奢谈。

“法权论”和“市场论”这两种自由在形式上似乎可以分别在个人生存和社会秩序层面形成统一,但其内涵及在历史进程中的实践投射在相当程度上都彰显了两者之间的矛盾,用美国学者盖尔斯敦(William Galston)的话说,“法权论”是基于个体间“差异”而言的、主体间关系在公共理性方面的折射,而“市场论”实际上是“自治”内涵的、用以处理系统内部运行问题的综合构想,就系统内部主体间的关系问题——主要反映为资本霸权问题——当时没有给出足够的自觉意识和有效的解决方法。<sup>⑫</sup>马克思注意到了“民主与专制两种交往政策”的分野<sup>⑬</sup>,其中也涉及了对资本之于新闻业的伤害,不少学者对此认识相当充分,但坦诚地讲,这种自觉意识却几乎没有进入到国内世界新闻史的写作进程中。这正是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对新闻出版自由概念粗暴殖民所带来的先天不足,在历史诠释方面展现出的与本学科之间的断裂由此显现:新闻自由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学、经济学或者法学的问题——是自由的一种演绎结果,新闻学话语在这一讨论中颇为鸡肋。

### 三、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念:能动、实践与解放

针对这两种在马克思时代颇为主流的自由内涵及其矛盾与局限性,有必要基于新闻学科的特定视角和既定的历史事实重新讨论新闻自由这一范畴。马克思是我们打开这扇门最佳的钥匙,一方面马克思对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都进行了有效地扬弃,这两种思潮恰对应了上文所谈的两种自由内涵,经济学的一端不必多论述,哲学的一端即便演进到了康德,所谓“法权”仍然是“使得自由成为原则”的条件<sup>⑭</sup>,马克思对这两者看法的综合值得关注;另一方面,马克思是参与到了对英国报刊税法议题讨论中的,我们从中更能细致地观察马克思在历史实践中对于新闻自由的核心理念和实现路径的看法。

(一)始终的批判态度?——重审马克思在报刊印花税法议题上的立场

在开始抽象的讨论之前,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对于英国报刊印花税的态度如何?这个问题似乎早已盖棺定论,马克思将报刊印花税称之为

“禁锢以自由精神进行创作的一种制度”<sup>④</sup>，钱婕也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尤为细致的考证和论述<sup>⑤</sup>，由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也推定“马克思对知识税始终持批判态度”<sup>⑥</sup>。然而，既有的相关研究和论述似乎都忽略了马克思的在报刊附刊税（增刊税）和《泰晤士报》的几则论述：“至于《泰晤士报》，它将从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报纸增刊印花税的建议中获得好处的唯一一家报纸。《泰晤士报》每天都出两个增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4万便士或大约166英镑13先令的增刊税”<sup>⑦</sup>。另外，之前被学者们注意到的《泰晤士报》之于报刊印花税的态度也并不是一贯的：“这家一贯极力为知识税和广告税辩护的报纸，现在对任何增刊税都反对”<sup>⑧</sup>。再如“《泰晤士报》不许法律干涉私人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才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印花税，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立法机关给它自己的报社免除增刊税”<sup>⑨</sup>。很明显，《泰晤士报》在印花税上的态度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来进行的双标评判，在竞争中能带来好处的是保留除附刊税以外的印花税种，保留广告税和纸张税可以最大化的打击对手，而去掉附刊税则是能省掉该报相对来说比例较高的税额而保障自身发展，这种趋利所带来的双标本身就背离了新闻出版自由的精神。

马克思对于《泰晤士报》在报刊附刊税上首鼠两端的态度表现了相当的鄙夷和嘲讽，这表明马克思对于附刊税的态度并不像对待其他税种那样简单的“就税论税”地反对——作为《泰晤士报》的对手方，他对印花税的批判有更深层面的思考，所以在新闻史研究中，对附刊税的集体无意识（仅有少数学者将其纳入考察范围<sup>⑩</sup>）是不合适的。从马克思的行文来看，这一税种和其他被称之为“知识税”的税种完全可以并列，另外，这一税种在应税对象层面的报刊属性显而易见，相较于被纳入“知识税”范畴的纸张税，附刊税之于报业的针对性明显更强，并且科布顿在1853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中将印花税、广告税和附刊税并列称之为“对传播知识材料的征税”。<sup>⑪</sup>基于这样的判断，笔者认为恐怕并不能将马克思对于报刊印花税这一税种集合的态度简单地理解为“始终的批判”，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对印花税的抨击和附刊

税问题上马克思的横眉冷对，背后所指的更深刻的批判对象是《泰晤士报》所代表的英国报业的垄断局面。<sup>⑫</sup>将附刊税排除在外，从而将马克思的态度一以括之的表达其实有意或无意地将马克思仅仅置于资产阶级报业管控对立面，从而使得其新闻自由思想也存在被纳入“法权论”论辩框架的危险当中，比如有些讨论涉及马恩的新闻自由思想时就仅仅关注到了其对于书报检查、保证金和知识税制度的批判，这就很可能将马克思的新闻自由思想简单化了。

## （二）垄断与专制：马克思新闻自由观念的历史基点

可以说，马克思之所以将报刊印花税称为“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一方面是政策本身作为控制手段确实对个人法权存在侵害，另一方面是他对垄断报业破坏新闻媒体内在自由价值的深刻认识。垄断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亦有学者做过相应论述，媒介集团通过在媒介市场上的垄断从而形成话语权的垄断，进而威胁到言论多元，而自由主体的多元性正是构成新闻自由的重要依托。<sup>⑬</sup>

垄断所引发的不仅是少数人权力在市场上的延伸，也包括向媒介内部的延伸，回到英国新闻史，大众报业时代的大亨们都“用极端的严厉来保证他们个人的绝对权威”，不少新闻工作者因为“无法适应老板的政治观点和管理策略”而失业，这种控制在卡瑞看来与之前政府管控时相比“并无不同”。<sup>⑭</sup>马克思虽没能如此细致地预见这一境况，不过他上面提及的一些论述总还对这种内涵更广的新闻自由有所彰显。不管是政府的管控，还是资本的介入，这两种“无本质区别”的弹压都招致了来自从业人员乃至更广大群体的反抗，不过就多数西方新闻史的写作而言，对于前者的反抗是更被重视的，而后者几乎不会被说明。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在抨击书报检查制度和报刊印花税的同时，还批评了许多新闻报刊。1842年，马克思在论文中写道“把新闻出版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书报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sup>⑮</sup>。马克思认为新闻业与单纯物质性的制造业、手工业等行业有根本不同，其产生于观念而又直接作用于观念，新闻出版自由首先是观念的自由，然后再于社会实践领域中寻求实

现,这就超越了“法权论”的新闻自由,使得新闻主体拥有了自由与否的自我判定权力,即新闻自由不仅仅是政府主导的权力机构承认或给予的自由,更是来自新闻主体内部的自由;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对“市场论”的新闻自由做出了隐晦的回击,所谓“行业自由”不能简单迁移到新闻出版领域,否则只会导向所谓“复数的自由”即“特权”。<sup>②</sup>在报刊印花税废除后大众报业迅速在英国发芽,“新闻业成为典型的商业化产业”<sup>③</sup>,并走向垄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亦对这种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同于自由本身的观点做了批驳。

所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直接暴露了“法权论”和“市场论”的狭隘视野,这两种论调只看到限制新闻自由的媒体与政府之间的拉锯,对于构成新闻自由阻碍的其他更为隐蔽的要素比如资本、物质条件乃至舆论环境无涉及。诚然,对抗政府辖制只能构成新闻自由在实践中落地的一面,可是在大多数的新闻史写作中,这一面却被扩大为18-19世纪欧美争取新闻自由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矛盾——即便在诸多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作品中亦是如此,在今天也被一些观点视作论证西方制度优越性的论据,这其中的片面和双标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而马克思在当时对新闻自由的论述就已经超越了上述论述的局限之处。

(三)能动性·实践性·人民性:马克思新闻自由观念的意涵

可以说,马克思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个别阶级利益的法律权利,而是一种面向全人类的、基于人本身的、用以克服诸方面局限的能动性自由,即贯彻自由的意志、能力和实践。能动性的马克思新闻自由内涵是基于马克思之于“法权说”和“市场说”自由观念的扬弃之上。

但是,倘若我们把这种面向人类解放的能动性自由理解为西方价值观中的自由理念,则是大错特错。在西方世界强调更多的“法权论”和“市场论”的自由内涵中,这种能动性的发挥与否对于自由概念本身并不重要,然而,法律和资本的许可不等于实践,而能动的不发挥——“丧失了勇气”势必无法导向“报刊的创造力”,遑论新闻自由的实际落地。这种“创造力”的发挥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限制:“外部的桎梏”“内部的局限性”和群众“民族

意识”的不足。<sup>④</sup>

“外部的桎梏”相关论述与“法权论”的自由内涵接近,都以政府管控为否定对象,然而如何突破这种桎梏,马克思提出了一条区别于议会协商的斗争性道路,这涉及他对报刊“内部的局限性”的探讨。1849年,马克思将德国书报检查制度下的日刊斥作“是全世界最软弱、最无力、最胆怯的刊物”<sup>⑤</sup>,这一叱骂实际上是希望报刊在面对专制政权确立起的外在规制时,应当克服自身的“软弱”“无力”和“胆怯”,实现创造性的涌流,从而贯彻新闻自由的理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种克服符合“某一如此这般的行动主体免于何种束缚或强制去做何种何样的事情”的自由定义,仍然包括行动者(新闻主体)、约束性条件(个体作为有限主体所受到的限制)和行动(对自身局限性的克服)的“三位一体关系”<sup>⑥</sup>。不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些无印花激进报纸和马克思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报刊活动可以归入此类,乃至新闻自由先驱弥尔顿私自印刷《论出版自由》所传达出的“不满和愤怒”亦是这一内涵的显现。<sup>⑦</sup>

所以,外在桎梏的击破绝不是靠着报人的祈求或是议会框架下的讨论,媒体内部的局限性也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克服,而是要在具体的、斗争的、能动的、全过程的报业实践中争取、践行新闻自由。相应的,马克思对于自由报刊的内在素质提出了要求,即“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sup>⑧</sup>,报刊要实现自由,就应当充分发挥好“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sup>⑨</sup>的作用。这些品质的呈现、角色的扮演是应然的原则,并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转移。由此,马克思跳出了英美新闻史叙述的单一矛盾窠臼,新闻自由的成立需要取决于报刊自身职能的发挥,报业追求自由法权的实践与这种发挥都是其能动性的体现。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念与其致力大半生的报业实践发生了统合,其思想体系中革命性的一端由此彰显,继而“开创了无产阶级报刊的革命传统”<sup>⑩</sup>。

马克思不仅对报刊主体有要求,同样也将人民群众视作构成新闻自由落地的关键要素。在德国《书报检查令》发布后的自由报刊低潮中,马克思认为“人

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识”<sup>⑧</sup>,这种状态使得报刊无法发挥作用,宪章运动后,相对进步的激进报刊发展举步维艰,马克思也撰文称“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sup>⑨</sup>。这些表述都强调了人民群众在能动的新闻自由实践中的关键角色,初步提出了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内涵:只有人民群众保持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关切,媒体才有生存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所以,对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报刊而言,人民性是其必备品质,这种品质一方面作为阶级性而存在——“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sup>⑩</sup>;另一方面,人民性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自我宣称,而是要在报业实践中充分调动起人民的关注、情绪和反应,做到为人民所接受、所认可,才能把报刊的自由诉求落到实处。

有学者注意到阿尔都塞等思想家所论述的马克思思想演进的“认识论断裂”<sup>⑪</sup>,认为马克思的新闻自由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sup>⑫</sup>。但如果自由对马克思而言是“为他的工作提供连续性的基本主题之一”,“人潜能实现”的自由内涵一以贯之,马克思在之后对自由的讨论确实有着更具体的语境,但并没有否认其青年时期有关自由的具体论述,甚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中存在“一些基本观点的重复”。<sup>⑬</sup>类似的,陈力丹教授也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自己早期的报刊思想,他的思想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试图以唯心/唯物的二分法来区分马克思的具体表达“有些可笑”。<sup>⑭</sup>基于这样的认知,在马克思新闻自由观念具体语境中、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并置由此发掘其内在持续而共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应当更贴近马克思原意。

这种新闻自由在之后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落实到了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即“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sup>⑮</sup>,这种自由一方面体现为人民性,比如列宁高呼“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sup>⑯</sup>,其出版自由观念重点即为“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sup>⑰</sup>;另一方面体现为斗争的实践性,比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sup>⑱</sup>,这

也体现了新闻出版自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sup>⑲</sup>。这种路径是将新闻作为实现政治解放的重要工具,所以,新闻自由也应服务于包括“民族自由解放”“党内民主”“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等聚焦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的目的。<sup>⑳</sup>马克思当然也赞同这一路径,《新莱茵报》作为自由报刊的典型代表也是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sup>㉑</sup>,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和诉求。

由此,“自由报刊”在整个人类解放事业当中的地位可以初步地确定下来了:即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馈经济及政治基础——“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继而实现改变世界的目标,在这一层面上,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该“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sup>㉒</sup>,自近代以来,人类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涉及精神层面的思想解放总被视作社会变革的前置条件,似乎在经济社会的物质层面发生变革的初期这一使命就业已完成。但实际上我们在精神层面仍然处于螺旋之中。“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㉓</sup>这种批判时至今日仍在继续,“现实的矛盾和压迫……以其他的、符合理性的思想形式反映出来”<sup>㉔</sup>，“自由报刊”成为连接人类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路径和媒介,是建立健康平衡和谐自治的主客观统一世界的中保,也是我们今天探索“新闻世界”存在与否的思想宝库。<sup>㉕</sup>

马克思有关“自由报刊”的论述更为具体地论述了这一观点,其一,“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sup>㉖</sup>。这是人民群众用以自我革新的关键媒介,能够帮助人民群众“在思想上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从而“胜任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社会重任”<sup>㉗</sup>。其二,“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

体现的文化”<sup>⑧</sup>，是人民群众开展精神斗争的重要武器。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充分强调了这种斗争的实践属性<sup>⑨</sup>，着重强调了“此岸世界”<sup>⑩</sup>，由此指向“重建以人为本的现实解放”<sup>⑪</sup>的根本目的。

#### (四)余论

马克思有关新闻自由的论述是植根于社会实践、有具体历史语境的，由此为之后马克思新闻观念研究提供了三点启示：首先，仅强调马克思与西方新闻自由思想之间的阶级差异是不够的，这很容易导向一种纯粹出于立场的意见，并割裂马克思与其他西方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掩盖马克思在人类思想谱系中的关键影响；其次，应当关注到马克思对于19世纪英国新闻自由混杂而矛盾思想的超越，马克思的新闻自由思想，其价值不仅仅是强调了新闻主体在具体实践中遭遇的能动性限制，也包括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继承以及其“现实性”的转向<sup>⑫</sup>；第三，马克思新闻自由思想的先进性无可置喙，但若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则毫无意义，作为精神解放乃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重要标识和理想状态，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意涵下的新闻自由，是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全方位指导，构建我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基础。

在充分批判西方新闻自由的资本控制和阶级分化的虚伪性后，如何丰富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关于新闻自由的内涵，是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能动的新闻自由思想内涵后，其核心问题依然在于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新闻主体的能动性，而“人民性”作为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创新点，和马克思早期对新闻自由内涵的构建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的时代，新闻自由能动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的语境处于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自由所抗争的对象在形式上表现为自由资本之下的反自由要素，包括资本力量、资产阶级政府本身的立场和工人群体的涣散等等。中国经历了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今进入到新时代，以反对一切形式压迫为重要内涵的人民性原则已经逐渐地在新闻事业当中确立起来，并且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核心诉求相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内涵的本质并无变化，但时代所特有的需要冲破的外在和

内在的桎梏却构成了新的挑战。就当前媒体环境而言，公民个体面临着“后真相”、信息茧房和“非科学化”的威胁<sup>⑬</sup>，群众集体的公共舆论参与则往往呈现出无序的“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sup>⑭</sup>，而专业媒体在媒体融合浪潮中面临“结构性困境”<sup>⑮</sup>，必须警惕新闻媒体迷失在技术旋涡而失去自身主体性的危险——这种主体性的底色就是人民性。由人民性驱动的能动性和实践性的缺乏，正是马克思的新闻自由观念于当下的重要关切。陈力丹教授非常尖锐地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媒的宣传基调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环境氛围”，即便在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人民性后，人民性依旧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有被“扭曲”之嫌。<sup>⑯</sup>如何充分调动媒体的积极性，让其充分致力于“教育、组织、动员和反映群众”“向群众学习和为人民群众服务”、将人民群众作为“积极的社会力量”<sup>⑰</sup>使其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应当是新闻业界和学界重点思考的问题。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如何具体而微地渗入到新闻生产流程中，继而成为媒体从业人员秉持的最核心原则，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新闻自由的客观诉求，也是推进媒介体制改革达成媒体既定使命的重要课题，更是充分提升新闻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 注释：

①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载《新闻大学》，2007(3)。

②反知识税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由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组织共同推进的、以逐步降低并最终废除报刊印花税诸税种为诉求的社会政治运动，主要表现为议会斗争、拒缴税款及舆论对抗。

③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24-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65页，人民出版社，2013。

⑤王润泽：《实践转向与元问题聚焦：对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的思考》，载《新闻记者》，2022(2)。

⑥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⑦唐海江：《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新论》，83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⑧J. H. Wiener.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British Press, 1830s- 1914, Speed in the Age of Transatlantic Jour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32.

⑨ 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27-28页,新华出版社,1980。

⑩ 张昆主编:《外国新闻传播史》,6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⑪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张允若、程曼丽:《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3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⑫ 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⑬ 此处引用依次参见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吴小坤:《自由的轨迹——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1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陈力丹、董晨宇:《英国新闻传播史》,98-10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李磊:《外国新闻史》,4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⑭ 此处引用依次参见黄春平:《西方传媒内容监管机制的历史考察》,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林婕:《外国新闻传播史》,6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克里奇:《电子媒体的法律与管制》,29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⑮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3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⑯ 刘笑盈:《中外新闻传播史》,124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张聪:《从英国媒体看国家软实力的兴衰》,59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⑰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1页,新华出版社,2001。

⑱ 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⑲ J. Kean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Polity, 1991, pp. 11-17.

⑳ 姜华:《试论现代新闻自由观念的三个起源》,载《新闻记者》,2014(12);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51-152页,学林出版社,1999。

㉑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1页,商务印书馆,1958。

㉒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389页,商务印书馆,1959。

㉓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15页,商务印书馆,1964;李强:《自由主义》,191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㉔ 詹姆斯·密尔:《论出版自由》,2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页,人民出版社,2001。

㉖ 王润泽、王汉威:《基于产业视角对英国报刊印花税政策的影响分析》,载《新闻记者》,2019(12)。

㉗ 向淑君:《自由还是压制——从英国激进主义报刊的兴衰史解读出版自由》,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3)。

㉘ 张咏华、何勇、郝进平、曾海芳:《西欧主要国家的传媒政策及其转型》,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㉙ 唐亚明、王凌洁:《英国媒体体制》,32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㉚ 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

播、电视与新媒体》,22-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㉛ Earl Stanhope. Stamp-Duty On Newspapers, 1815-07-06, <https://archives.parliament.uk/online-resources/parliamentary-debates-hansard/>. 下列英国议会辩论相关文本若无标注,则均来自此网站。

㉜ Edward Lytton Bulwer. Newspaper Stamp Duties, 1835-08-21.

㉝ Mr. Trevor. Taxes On Knowledge, 1832-03-09.

㉞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Unstamped Publications-Seizures, 1835-08-10.

㉟ 詹姆斯·密尔:《论出版自由》,12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㊱ “曼彻斯特学派”是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对“反谷物法同盟”的蔑称,是1838年成立的、以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主、支持自由贸易的社会政治组织。

㊲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dvertisement Duty, 1853-07-01.

㊳ Mr. Milner Gibson. Newspaper Stamps—The Periodical Press, 1854-05-16.

㊴ Mr. Bright. Newspaper Stamps, Etc., 1855-03-19.

㊵ M. A. Shepherd. "The Origins and Incidence of the Term 'Labour Aristocracy'". Bulletin—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1978, 37: 51-67.

㊶ 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㊷ 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33、5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㊸ 向淑君:《自由还是压制——从英国激进主义报刊的兴衰史解读出版自由》,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8(3)。

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1页,人民出版社,2003。

㊺ Martin Conboy.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Sage, 2004, p. 104.

㊻ 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42-43、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㊼ Mr. Bright. Adjourned Debate Third Night, 1861-04-29.

㊽ 陈力丹:《西方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固有矛盾》,载《新闻大学》,2008(3);石义彬、庄曦、周娟:《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表达》,载《当代传播》,2009(2)。

㊾ G. 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37.

㊿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5页,商务印书馆,1964。

① Y. Tao, et al. "Exponential Structure of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67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2017, 14(5953): 345-376.

② 余秀才:《微信传播的马太效应、木桶效应与涓滴效应》,载《编辑之友》,2015(12)。

③ Bright. Advertisement Duty, 1853-07-01.

④ 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6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⑤张好玟:《对英国报业史上废除知识税的重新解读——从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看知识税的废除》,载《新闻大学》,2006(1)。

⑥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多元主义》,19-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⑦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397页,开明出版社,1993。

⑧伊曼纽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3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65页,人民出版社,2013。

⑩钱婕:《印花税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马克思〈报纸印花税〉考证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1(9)。

⑪陈力丹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1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⑫⑬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83、159、212页,人民出版社,1998。

⑮钱婕:《马克思的反知识税思想》,载《新闻界》,2012(21);陈力丹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1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⑯Mr. Cobden. Financial Statement—The Budget, 1853-04-28。

⑰报业垄断的相关表述除了上述引文之外,亦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232-234页,人民出版社,20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641-646页,人民出版社,2016。

⑱S. Dawes. "Press Freedom, Priv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Journalism Studies, 2014, 15(1): 17-32。

⑲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52-5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⑳㉑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3、193-195、378-381页,人民出版社,1995。

㉓陈力丹、董晨宇:《英国新闻传播史》,16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㉔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416、275页,人民出版社,1961。

㉖王福生:《自由的谱系——何种自由,谁之追寻》,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㉗朱清河、时潇锐:《弥尔顿与梁启超自由主义报刊思想之比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4)。

㉘㉙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71、381、153页,人民出版社,1995。

㉛郑保卫:《论〈新莱茵报〉的历史贡献——写在〈新莱茵报〉创刊170周年之际》,载《新闻爱好者》,2018(6)。

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1页,人民出版社,2003。

㉝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5页,商务印书馆,2011。

㉞苑秀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0)。

㉟J. J. O'Rourke. The Problem of Freedom in Marxist Thoug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 11, p. 53, p. 12。

㊱陈力丹:《马克思早期新闻思想》,24-2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

㊲赵月枝:《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载《经济导刊》,2014(7);孙泊、姜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跃迁》,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8)。

㊳《列宁全集》,第32卷,230页,人民出版社,2017。

㊴陈力丹:《论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

㊵《毛泽东选集》,第3卷,1063页,人民出版社,1991。

㊶时啸鸽:《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民主意蕴及时代启示》,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1)。

㊷参见邓绍根:《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新闻自由”的概念史》,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展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1);陈建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载《当代传播》,2016(6);郑保卫:《论列宁新闻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当代价值——写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载《国际新闻界》,2020(4)。

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9页,人民出版社,1965。

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68页,人民出版社,2002。

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页,人民出版社,1962。

㊻张有奎:《虚无主义的终结与人的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的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3)。

㊼关于“新闻世界”的概念,参见王润泽:《实践转向与元问题聚焦:对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的思考》,载《新闻记者》,2022(2)。

㊽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79、179页,人民出版社,1995。

㊿牟成文:《马克思精神解放理论简论》,载《哲学研究》,201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页,人民出版社,1960。

㉁徐双溪、张宇:《人民的现实幸福:马克思真理观的价值向度》,载《理论月刊》,2015(8)。

㉂左云天、杨楹:《人民的解放与幸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真谛》,载《学习与探索》,2020(2)。

㉃王浩斌、李勇:《超越方法论转变的认识樊篱: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转向的多重意向》,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彭兰:《人人皆媒时代的困境与突围可能》,载《新闻与写作》,2017(11)。

㉅于建嵘:《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以2012年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朱鸿军:《走出结构性困境:媒体融合深层次路径探寻的一种思路》,载《新闻记者》,2019(3)。

㉇陈力丹:《将习近平“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落实到新闻实践中》,载《新闻界》,2018(9)。

㉈王润泽:《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人民性原则的实践路径》,载《编辑之友》,2021(6)。